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1), 50-5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1898

Hans汉斯

托举家庭的女工：包容性视角下女性农民工社会排斥困境的解决路径

邹亚林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6日

摘　要

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女性农民工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日益提升，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该群体在制度、经济和文化层面遭受着多重排斥，而这些社会排斥共同导致了女性农民工在进入婚育阶段后被迫牺牲职业发展，从而陷入到高强度的家庭再生产劳动和代际贫困循环中。本研究运用包容性治理理论，构建了多元主体、过程合作、成果共享的分析框架，并结合遂宁市凉水井社区、甘肃天水麦积区及青岛市城阳区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社区、工会、市场专业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能够建立起基于信任与对话的合作机制，并为女工提供精准有效的公共服务。因此，本研究认为，基于包容性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打破女性农民工社会排斥困境，促进其社会融入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女性农民工，公共服务，包容性理论，社会排斥

Women Workers Sustaining Families: Solutions to the Social Exclusion Dilemma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from an Inclusive Perspective

Yalin Zo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26; accepted: October 2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6, 2026

文章引用: 邹亚林. 托举家庭的女工: 包容性视角下女性农民工社会排斥困境的解决路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1): 50-58. DOI: 10.12677/ass.2026.1511898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ization,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keeps rising, forming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labor market. This group suffers from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exclusion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omains. Such exclusion forces them to sacrifice career development after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trapping them in intensive family reproductive labor and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cycles. Drawing on inclus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eaturing multi-stakeholders, procedural cooper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and conducts case analyses of Liangshuijing Community in Suining City, Maiji District in Tianshui of Gansu and Chengyang District in Qingdao. It reveals that collaborative engagement of communities, trade unions and professional market institutions helps establish trust- and dialogue-base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delivering targeted public services for women work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system rooted in inclusive governance serves as an effective path to break the social exclusion dilemma and advanc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Female Migrant Workers, Public Services, Inclusive Theory, Social Exclu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0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1]，立足高质量发展目标切实把握好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等 14 条任务举措。这表明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仍是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的深化，人口向城镇流入为产业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红利长期以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大规模的人口城乡迁移中，农民工群体重塑了劳动力市场格局，而其代际的更替正深刻地改变着流动人口的特征和诉求。进入 21 世纪以后，以 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了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1]。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成长于城乡交融的社会环境中，追求体面劳动、家庭团聚与城市尊严，渴望在城市中实现劳动力到新市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女性的身影越来越多。她们逐渐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中，这就让农民工的性别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数量从十年前的 2.739 亿增长到了 2024 年的 2.997 亿，女性农民工在农民工总数中的占比从 2013 年的 33.0%增长到了 2024 年的 37.6%。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数量是不断增长的，而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增长的速度更快，尤其是本地女性农民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相比于男性农民工，女工的处境显然更加复杂和困难，她们承担着家庭责任与城市排斥的双重压力。一旦进入到了婚姻与生育阶段，男性农民工往往进入大城市以积累经济资源，而女性则以回归家庭为主，不得不返乡或者是迁往县城陪读。为了子女教育在县城购房、举债生活，女工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经济负担，使其深陷高强度的劳动与代际贫困的循环之中。这反映出当下公共服务的配置依旧以

[1]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jy/202411/t20241122_530511.html

户籍人口为基础，社会保障的缺位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权利无法随人流动的困境。而要回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婚育、育儿、就业等人生节点上的特殊需求，亟待构建更加包容的公共服务的优化配置体系。

2. 使用须知

2.1. 文献综述

在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早期学界聚焦于其户籍制度下的社会融入与认同的障碍[3]，研究认为童年的留守经历让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乡土情结，随着其流动进入城市又让他们脱嵌于城市劳动，因此呈现出双重脱嵌于乡村与城市社会的特点[4]。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并没有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根本性差异[5]，他们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心理预期不同，对权利和地位的要求更高，但是他们仍然处于中低市民化阶段[6]。在户籍制度下城镇依旧呈现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住房与教育权利的系统性排斥。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为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地方往往将基层的教育资源向城镇过渡聚集[7]，这就导致了大量农村家庭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而将子女送往县城或者城市读书，陪读妈妈由此产生。

但是，当前对于女性农民工的专门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现有研究普遍将女性角色简化为照料者或者牺牲者，将女性陪读、看护、家务等家庭再生产活动性别化为女性农民工的母职范畴[8]。这忽视了其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和公共服务诉求主体的双重身份，未能剖析教育、住房、托育等公共服务将女性农民工排斥在制度外的结构性压迫，使女性在无酬照料劳动与有偿劳动之间承受双重挤压[9]。在此过程中，女性农民工依旧面临着制度性的排斥。由于子女无法在务工地平等享受义务教育资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女工被迫在“务工”和“育儿”之间做出抉择，最终以牺牲自身职业发展为代价维系家庭的再生产[10]。同时，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实践会随着家庭内部再生产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地变化，历经生育抚养子女、子代教育甚至抚养孙辈的需求的转移[11]，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被剥夺，无法拥有经济生活自主性的机会。

2.2. 理论基础

本研究将运用社会排斥理论分析女性农民工在现代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困境，运用包容性治理分析女性农民工公共服务的优化路径。包容性治理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下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传统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传统管理型的治理模式在应对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时难以有效应对[12]。包容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包括三个维度：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合作性、治理成果的共享性。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是包容性治理的逻辑起点，社会治理的包容性应通过扩大治理主体的代表性和包容性[13]。而主体的扩大能够整合各类资源，吸纳边缘性利益相关者进入到治理范围中，构建出多层次的灵活协调的治理结构；治理过程的合作性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各主体基于平等、信任与互惠原则展开互动合作。包容性治理寻求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运用去中心化的结构，推动形成开放、灵活且可持续的治理网络；治理成果的共享性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包容性治理的重要目标。包容性治理不仅追求经济增长，更注重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共享。通过增加公共服务可及性等方式，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边缘群体能够公平享受发展成果。包容性治理指导下的公共服务能够有效破除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等社会排斥困境。本文的分析框架图详见图 1。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法，基于包容性治理三维框架展开质性分析。案例选取上，遴选遂宁凉水井社区托育服务、天水麦积区心理支持服务、青岛城阳区就业保障服务三个案例，地域覆盖东中西部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兼具典型代表性与维度差异性，能够系统呈现不同场景下公共服务的供给逻辑。数据搜集以二手资料为主，通过地方政府官网、官方报刊、学术数据库等渠道，以“女性农民工公共服务”“农民工社区服务”等为关键词检索。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二手资料缺乏一手访谈的微观深度，难以完整呈现主体间权力互动与个体真实体验；案例覆盖范围有限，结论普适性不足；官方资料侧重成效呈现，对实践矛盾披露不充分，可能存在信息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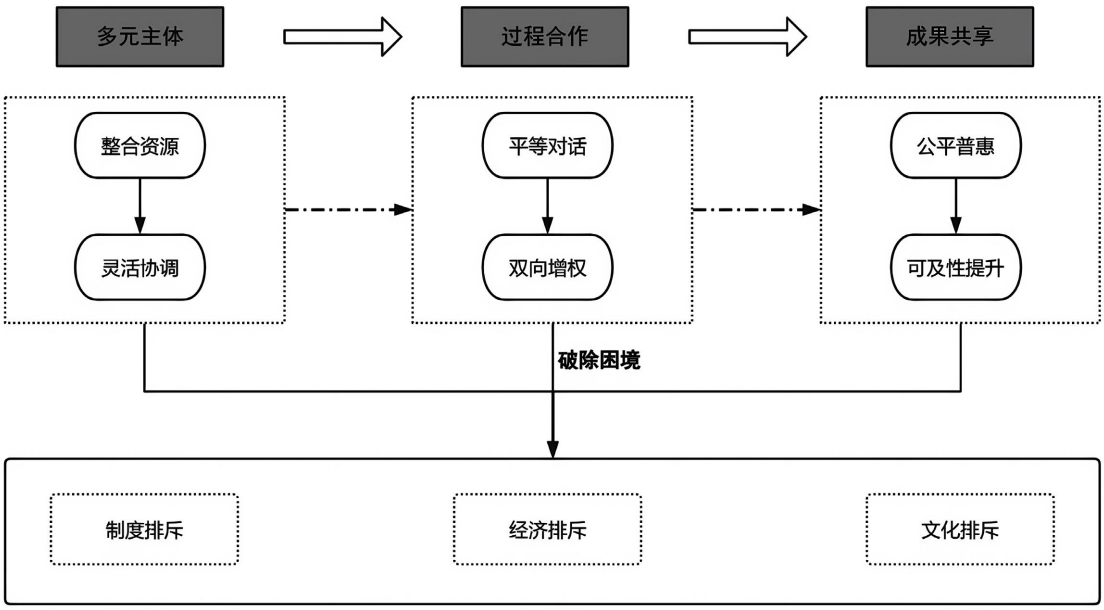


Figure 1. Figure of inclusive governance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 1. 包容性治理分析框架图

3. 当前女性农民工面临的社会排斥困境

社会排斥理论(Social Exclusion)起源于欧洲福利国家对贫困边缘群体和社会不公平现象的研究，强调个体或群体因制度安排而被剥夺参与主流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机会[14]。社会排斥理论认为社会边缘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是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对象[15]，而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面临着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文化排斥等多重排斥。

第一是制度排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治理体系让农民工这个流动人口群体难以获得市民身份，从而被排除在基于属地原则构建的公共服务体系之外。这种制度排斥具有明显的身份筛选功能，将农业户籍持有者建构为非完全市民，剥夺其平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权利的资格。同时，随迁子女入学要提供“五证”甚至更多证明材料，程序繁琐且隐含筛选机制，实质上将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农民工家庭拒之门外；第二是经济排斥。女性农民工不仅面临着作为“农民工”身份的户籍歧视，更承受着作为“女性”的性别歧视，面临着制度性身份歧视和性别权力结构的双重压迫。相比于城镇女职工，女性农民工所受到的行业选择和工资支付的性别歧视更为严重[16]。她们高度集中于建筑业、家政、餐饮等行业，被排挤在工资收入更低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这些行业普遍缺乏规范的劳动合同，企业规避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即使部分地方推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其高缴费比例与低待遇预期也使收入微薄的女性望而却步。同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险种的跨省转移接续依旧存在障碍，导致作为流动人口的女性农民工难以有效积累权益。同时，女性农民工通常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料责任，她们的流动通常是受到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家庭因素的影响。由于流入地的入学门槛高、升学受限等压力，

让很多母亲选择留守农村或者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这是公共服务排斥的结果，也反过来限制了女性自身的职业发展与定居意愿；第三是文化排斥。主流城市社会往往将农民工视为外来者和乡下人，他们虽然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却与市民身份之间存在断裂，导致其遭受群体性的污名化和社会疏离。社会交往疏离让她们无法很好的与城市社区进行融合，无法与邻里等周围的社会成员产生长久稳定的关系，继而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17]。这种文化排斥削弱了她们社会资本积累能力，使其难以通过本地社会网络获取就业信息、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18]。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文化排斥三种排斥类型详见表 1。

Table 1. Types of social exclusion faced by female migrant workers
表 1. 女性农民工面临的社会排斥类型

排斥类型	核心特征	具体表现
制度排斥	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身份与权利分离。	因农业户籍身份，被排除在流入地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核心公共服务体系之外；随迁子女面临高入学门槛。
经济排斥	面临户籍与性别双重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	被挤压至低薪、不稳定、低保障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因承担主要家庭照料责任，职业发展严重受阻，社会保险权益难以积累。
文化排斥	遭受社会偏见，导致社会关系疏离与融入困难。	被标签化为“外地人”，难以融入城市社区网络，导致其社会资本薄弱，获取信息的渠道受限。

4. 针对女性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案例

4.1. 托育照料服务

遂宁市船山区的凉水井社区聚焦农民工家庭现实需求，通过提供直接的儿童托管公共服务，有效缓解了女性农民工的育儿照料负担。凉水井社区开设了“周末快乐家园”，每周六定期开放“童伴之家”，组织文体活动、手工制作等，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固定、免费的课外陪伴。这项服务将女性农民工从周末的照料职责中部分解放出来，可以获得必要的休息或投入其他活动。此外在寒暑假，凉水井社区还开展了“假期安心托管”。通过整合资源和志愿者服务，免费提供作业辅导与兴趣课程。此举直接解决了女性农民工在长假期间中最棘手的子女看护难的问题。在课外兴趣方面，凉水井社区推进阅芽计划，面向农民工家庭免费提供书籍借阅服务，这从认知发展与教育支持层面为家庭，特别是母亲，提供了补充性支持。2025 年以来凉水井社区的托育服务已经累计服务农民工子女 257 人次[19]。这些公共服务通过社区承担部分育儿职能，实质性地帮助女性农民工减少了照料时间消耗，缓解了精神压力，为其创造了更有利于个人发展与就业稳定的支持性环境。

4.2. 心理支持服务

随着新业态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的就业开始向外卖员、快递员等行业倾斜，其中女性外卖员、快递员的身影逐渐增多，她们面对工作强度大、情绪压力高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持。甘肃天水麦积区为这些女性打造了专属关爱空间。在社区内设置了阅读区、健身区、共享服务区等功能区，提供休息、充电、急救等便利设施，打造“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难了能求助”的温馨港湾。同时，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开展压力管理、情绪调节讲座，通过案例分析与互动问答提问，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心理调适能力。同时，建立常态化支持机制，通过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建立妇联组织的力度形成组织化、网络化的服务体系，实现对女性农民工新就业群体的全覆盖关怀。在活动中，

女性还被鼓励参与进来，通过心愿卡、阅读分享等活动，鼓励她们表达情感、交流经验，构建互助支持的网络。

4.3. 就业保障服务

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针对辖区内女性农民工及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组织了“城工的她”公共服务项目。在项目筹备阶段，城阳区总工会进行了深入的需求调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女性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建筑工地，以及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聚集的电商产业园、物流站点等场所，通过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梳理出该群体在手工制作、家庭健康管理、生活美学与家居整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技能提升兴趣与实际需求。项目创新采用了“90 分钟技能圈”课程模式。每节课程严格采用“15 分钟理论讲解 + 60 分钟动手实操 +15 分钟集中答疑”的教学结构，这样就能够确保学院能够在紧凑的时间内高效掌握一项实用技能。课程内容紧密对接前期调研需求，开设了女性养生知识、家居设计与收纳技巧等课程，力求把技能学习自然融入学员的日常生活中去。为有效解决女性农民工工作地点分散、工作时间不固定的问题，城阳区总工会着力打造了“流动技能驿站”[20]，将培训课堂从固定教室迁移至企业车间、项目工地、街道职工之家、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乃至田间地头，利用工作间歇的碎片化时间开展教学，实现了服务的“零距离”送达。这个活动预计开展 20 场，截止到 2025 年 8 月，已经开展了 9 次培训，惠及的女工达 400 多人次[21]。

5. 包容性视角下女性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提升路径分析

要为女性农民工提供更优质、更精准的公共服务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接下来将运用包容性治理来分析该如何提升针对女工的公共服务。

5.1. 构建多元主体网络

在包容性治理的视域下，传统单一主体治理的垄断格局被打破，通过广泛吸纳各类行动者，特别是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案例中，往往是构建某一主导组织为枢纽，比如社区、街道、工会等，并广泛链接和激活其他社会资源。在凉水井社区，基层社区组织扮演着资源召集人的抉择，它不仅提供场地与组织框架，并吸纳志愿者和公益项目等社会力量引入服务体系，从而回应了家庭对于儿童托管与教育的需求；天水麦积区的实践则拓展了公共服务主体的边界，通过引入市场力量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将市场专业的优势与社会组织的灵活优势相结合。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能够将碎片化的资源和诉求整合，形成一个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女性农民工群体从被管理的对象成为了具有能动性的参与主体，这让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有效。女性农民工成为了需求的定义者。青岛城阳区总工会深入工地、物流站点进行座谈与问卷调研，天水麦积区通过心愿卡、阅读分享鼓励感情表达和经验交流，这些做法确认了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其次女性农民工成为了互助网络的构建者。不管是社区的活动还是工会的项目，都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营造了社群交往的空间。女性劳动者之间、儿童之间、家庭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分享经验，在行政力量之外培育了共同体感情和意识，形成了内生的社会资本力量。

在此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能够带来精准化的服务，增强了异质性的资源的适配性和可及性，让公共服务体系更具有韧性。社区贴近日常生活的围观需求，市场专业机构拥有技术优势。面对女性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实践分散等现实情况，单一主体往往难以协调。正是在工会、企业、社区、志愿组织等多方资源灵活协调下，才能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与获取门槛，让公共服务在女性农民工群体中更加普惠和可达。因此，在包容性治理下，多元主体能够为女性农民工生成更优的公共服务，达到更优的治理效能。

5.2. 形成动态合作过程

治理过程的合作性并非静态的制度安排，而是动态的行动逻辑，即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市场等主体与女性农民工之间是基于平等对话、信任构建与互惠共赢的原则开展持续性互动的过程。治理过程的合作性首先体现在自下而上的共商共创机制上建立信任关系。传统公共服务往往由单一主体规划和提供，而忽视了服务对象的真实生活情景。在遂宁凉水井社区通过入户调研、志愿者意见征集等方式，将女性农民工的现实困境转化为具体服务内容，在此过程中，女性农民工不再是沉默的边缘者，而是拥有话语权的治理主体。这能够让女性农民工与社区组织之间建立起更坚实的信任关系——当社区被证明是可靠的支持者时，家庭更愿意参与其中并提出进一步需求，形成良性循环。这些做法能够将合作性内化为制度化的协商程序，在平等对话中减少服务供给的偏差。合作并非仅仅发生在公共服务执行的阶段，而是深度融合并嵌入到了问题挖掘界定、公共服务方案设计、服务效果评估的整个过程当中。遂宁凉水井社区的服务从周末延展到了寒暑假，从基础的看护服务到阅芽计划的公共教育服务，也必然是观察服务效果进行改进优化的结果。通过搭建平台来设计规则，促进交流合作来整合意见形成共识的过程控制上，女性农民工的需求，市场机构的专业服务，共同构成了针对女性农民工的公共服务。

同时，治理过程的合作性依赖于可持续的公共服务机制的构建。在案例中，女性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攻击中并非单项输出，是一个双向增权的过程。青岛城阳区总工会的“90 分钟技能圈”能够让女性农民工获得实用技能增强经济自立能力和自信心，也能够让总工会的项目提升其联系群众、服务基层的组织能力，释放组织活力。这种通过公共服务让社会合作增权、相互构建的格局使得包容性治理网络更加稳固有效。

5.3. 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包容性治理能够实现治理结果的共享性，确保发展的红利能够以可感知的方式转化为可惠及更多群体的实质性资源。对于背负沉重经济负担、家庭照料负担的女性农民工而言，时间是最稀缺、最被挤压的发展资源。在社区中开展托育的公共服务，实质上是承担了部分原本由母亲无偿承担的生产职能，让女性农民工获得此前被强制占用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女工从全天候无偿照料者的身份中抽离出来，获得必要的休息或者投入到社交、兼职中去。这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于社会边缘群体基本生存的救济，转向了赋能发展的共享逻辑。共享性不仅关注物质、时间等资源的再分配，比如说身心健康、尊严感和归属感等无形的公共服务福祉的普惠性。部分女工往往承担着高强度、高流动性的新业态从业者，往往在贡献劳动力价值的同时，身心健康和情感支持也被忽略。天水麦积区的社区服务中心专门打造了专属关怀空间和休息、充电、急救、心理咨询等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的效益并非简单量化的经济效能，而是帮助女性劳动者修复在工作中被磨损的身心状态，增强其面对风险的韧性。这种心理支持的软性成果能够被边缘群体所公平的享有，从而促进其社会更深层次的融入和精神层面的丰富。

包容性治理追求更深远意义的共享性，最终提升社会边缘群体的人力资本和内生动力。在青岛城阳区的公共服务项目中，女工习得实用技能并提升了个人效能，这种赋能不仅是生存型的救济，更是发展型的共享。它帮助女工积累面向职业变动和未来生活的资本，更好地在经济发展动态中提高收入改善境遇。因此，在包容性治理的公共服务下要致力于打破女工弱势地位下的结构性约束，赋予其成为发展成果共享者的地位和权利，从而在微观上推动社会公平和包容性的增长。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排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排斥和城市社会的文化性排斥共同

构成了女性农民工融入社会的现实壁垒。面对这一困境，传统的行政主导与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难以形成合力来为女工提供公共服务。本文引入了包容性治理理论，结合遂宁、天水、青岛三地的实践案例，构建了一个多元主体、过程合作、成果共享为特征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该体系是能够有效破除女性农民工社会排斥困境的解决路径。研究发现当基层社区、工会组织、专业机构乃至女性农民工自身被纳入到治理体系中，通过平等对话和信任机制的构建能够形成合作，使得公共服务的效能显著提升。凉水井社区的托管服务、麦积区的关爱空间、城阳区的流动技能驿站等实践不仅能够回应女工在育儿、身心支持、职业发展中的实质性需求，也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可享有的时间资源与人力资本，对她们自身进行了赋能发展。因此，在包容性治理框架下的公共服务，能够注意到社会边缘群体，通过重塑公共服务分配机制，推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致力于将包容性治理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女性农民工这个群体。相较于既有研究，本研究的学术增量集中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在理论视角贡献方面，本研究突破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社会排斥归因分析的局限，将包容性治理理论系统性地应用于女性农民工群体研究，构建了“多元主体－过程合作－成果共享”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了从“困境识别”到“路径建构”的理论延伸，也拓展了包容性治理理论在流动人口性别化议题中的应用边界。在实践路径贡献方面，本研究回应了既有研究对策偏宏观、缺抓手的不足，通过托育照料、心理支持、就业保障三类服务场景的案例比较，提炼出基层治理中的多主体协同模式，拆解了需求识别、服务交付、反馈优化的全流程合作机制，为各地优化女性农民工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范式。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对于案例的长期追踪和评估不足，对案例覆盖的地域和行业十分有限。展望未来的包容性治理，公共服务创新更应该超越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标签，致力于打造性别中立和权益完备的保障体系，这样才能打破对于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参考文献

[1] 冷向明, 赵德兴.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 政策困境及其变革研究——基于公民身份的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2): 98-102.

[2] 王欧. 照料 vs 经济——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J]. 读书, 2025(7): 32-41.

[3] 刘传江.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 人口研究, 2010, 34(2): 34-39, 55-56.

[4] 黄斌欢. 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2): 170-188, 245.

[5] 李培林, 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 社会, 2012, 32(5): 1-24.

[6] 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35(6): 100-109.

[7] 李永萍. 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研究——市场区位条件的视角[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1(1): 161-170.

[8] 王欧. 留守经历与性别劳动分化——基于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地的实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9, 34(2): 123-146+244-245.

[9] 管煜茹, 董晓林. 举家迁移农民工时间配置的逻辑、困境与突围——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框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9): 118-128.

[10] 李永萍. “一家三制”: 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6): 75-84.

[11] 王欧, 胡星宇. “中年工厂妈妈”: 县域产业发展下的农村女工母职实践——基于赣中 G 县工业园的实地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24(5): 41-60.

[12] 徐倩. 包容性治理: 社会治理的新思路[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4): 17-25.

[13] 李春成. 包容性治理: 善治的一个重要向度[J]. 领导科学, 2011(19): 4-5.

[14] 周林刚. 论社会排斥[J]. 社会, 2004(3): 58-60.

[15] 张晓玲. 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14(5): 71-82.

[16] 罗俊峰. 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7(6): 105-115.

[17] 田蕴丰.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交媒介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4.

[18] 刘媛, 熊柴, 蔡继明. 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为什么不高?——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4): 20-41.

[19] 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船山区村级农民工综合服务站“三位一体”做好暖心服务[EB/OL]. 2025-11-20. https://rsj.suining.gov.cn/xinwen/show/1d40c76033a6d0e958ea928f48641648.html, 2025-12-12.

[20] 张嫱嫱, 李冉. 服务动态丨“城工的她”赋能课堂让“她力量”绽放光芒[N]. 工人日报, 2025-08-29(06).

[21] 张嫱, 周赫, 李冉.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总工会“城工的她”课堂赋能女职工成长[EB/OL]. 2025-08-20. https://chinajob.mohrss.gov.cn/c/2025-08-20/446632.shtml, 2025-12-12.